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中日关系 > 论文

论日本的国民性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08-04-29 点击次数: 1722 作者: 张伟东

摘要:中日关系自1972年复交以来,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走过了友好蜜月期,也经历了政冷经热期,如今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很多,一定程度上日本的国民性对日本的外交取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从分析日本的国民性入手,深入剖析日本对华外交的内在文化动因,并提出了积极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些针对性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中日关系; 国民性; 文化因素

现代社会国与国之间的亲疏冷热无疑是各国国家利益的反映。而各种不同的外交取向其实都与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国民性即民族特性,是这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和性特点的综合,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倾向或行为模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文中指出:“冷战后,主导人类最大纷争和冲突的因素是文化上的差异。”[1]因此,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特性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也为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节点

19世纪中期以前,日本一直是“以华为师”,因为中国长期处于世界和亚洲领先的位置。但近代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习西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后迅速强大起来,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由于闭关锁国落伍了,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对英、法战争中均遭到失败,成为西方列强鱼肉的对象。日本由于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严重匮乏,它很快就走上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首当其冲的目标就是当时国土面积大、资源丰富而又积贫积弱的中国,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损失最惨重、民族创伤最深的国家。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经过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殊死搏斗,取得了彻底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较大发言权。但是,日本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长为经济大国,并积极筹划企图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摆脱国际“政治侏儒”的形象,迈向政治大国。中国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神速,新世纪中国大国崛起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经济上与日本的差距不断缩小,超越其只是时间问题。中日两国正处于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亚双强”时期,两国国民和领导层都面临着怎样理性和正确看待对方,重新塑造自身角色的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件速成的事情。因为中日两国的民族感情都特别强烈,都曾被边缘化,两国国民潜在的强邻大国心态根深蒂固。如何处理好中日关系,关系到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两国领导人和国民都应拿出智慧和勇气解决中日两国如何共存繁荣,对国际社会作出一个不同制度的强国、大国和平共处的典范,真正实现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由“政冷”低谷走向“暖春”的关键时期。2007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的访问,2007年4月1日到13日,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的访问,双方确认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在首脑外交的带动下,中日两国在防务互信、政党交流、东

海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2007年12月27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国进行了“迎春之旅”，中方给予福田以破格的高规格接待。于是有中外媒体和学者认为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到“蜜月期”，前景一片乐观但实践表明中日双方在利益的关注焦点、观察视角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不会因为政治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因为这些差异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这显然才是中日两国理解对方的关键所在。’ ‘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 [2]

二、日本的国民性特点

(一)日本国民的岛国根性

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曾指出：“我们脚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动……除了水，我们岛上几乎什么原料都没有。[3]在这样恶劣自然条件下生存的日本国民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强烈的危机感、团结心、向外扩张的侵略本性及狭隘的民族心理，即岛国根性。

日本人极富团队精神，有集团意识。因此，人们常说，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同时，日本为了发展自己，形成了善于学习的特点，并且善于转化，消化为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东西。日本在历史上先后向比它先进的国家学习，有三次高潮，古代学中国，近代学欧洲，现代学美国。对于欧美技术，第一代引进，第二代模仿，第三代创新。在对待职业方面，有很强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技术精湛，有一种“职人意识”。比如，日本人在下班后，自觉地留下来继续自己的工作，而不问报酬，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日本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其岛国根性:即过度的危机意识，向外扩张意识及狭隘的民族心理。自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通过殖民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等受害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的扩张意识仍然阴魂未散，日本屡屡突破和平宪法，并向海外派兵就是例证。过度的危机意识使得日本人对周围的环境过度敏感，对周边国家地区的发展采取一种猜忌、疑虑、对抗的态度和政策。例如: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现出极大的不安。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导致极端的利己主义，对周围世界孤傲冷漠、自私狭隘，使日本在国际社会异常孤立，故有“国际孤儿”之称。“日本在各种国际事件，地区纠纷，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等一切场合只考虑自己，对别国的复杂问题或有损于自己利益的问题竭力回避。” [4]从根本上来讲，这种民族性格可视为一种不愿对世界负责的狭隘的集团心态。

(二)日本民族的实用主义原则和功利主义态度，形成了与强者为伍、欺凌弱者这一典型的丛林法则的特点

日本人在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很重视与本国的实用联系起来，这种功利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日本民族是以文明对自身实用的需求来决定的，也就形成了日本人崇拜强者、蔑视弱者的特点。日本人认为，弱者服从强者、强者欺负弱者，天经地义。在对外侵略中，嗜杀的血腥特质表现地淋漓尽致，因为他们骨子里浸透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也是日本否认侵略罪行的根源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缺乏一种作为“人”的应有之义。学习中国，忽略了儒家文化中的“善、仁，’ ;学习欧美，遗漏了基督教文化中的“爱”。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性格的劣根性。

在历史上，喜欢与强者结盟几乎成了日本的一种外交传统，它先后三次与当时世界最强国结盟:即英日同盟、德意日同盟和美日同盟。二战战败后，日本对美国俯首称臣，对驻日美军服服帖帖，这令不了解日本国民性的美军大出意外。因为美军认为很难驯服这些从小就受军国主义熏陶的日本人，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认为这也会激起日本人对美国的强烈仇恨。1954年，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池田勇人向美国驻日使馆经济参赞韦林表达了对美依附、想与美国这一强国结盟为伍的外交思想：“日本人渴望你们某个强大国家的有意义的保证，正如人们渴望雇主，政治上的良师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样。” [5]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同时，日本人对于比自己弱的、不如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那就从心底瞧不起，这是一种典型的丛林法则观念。所以，日本人在二战后只向美国、苏联服输，而从不承认是输给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各国.也不认为是输给正义(因为日本人没有正义概念)。

(三)日本民族的武士道传统

日本人崇尚武力，来源于武士道传统。武士道，从制度上讲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基本上是战功显赫的特权阶层。由于武士道高居“四民”之首，其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武士道逐渐成为农工商阶层共同的行为准则，成为日本民族特有的意识形态。武士道，即武士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鼓吹发挥“勇”、“智”，充分发挥斗狠、轻生、残酷、狡诈的特质，要求武士效忠主君，克己奉公、廉耻守信，而丝毫没有“仁爱”、“平等”的理念。其核心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为主君毫不保留地舍身献命，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武士道强调精神的作用，轻视物质、崇尚精神，认为死亡是精神的胜利，从容不迫地迎接死亡才是美德。武士道讲求崇拜强者、蔑视弱者、崇尚暴力、对弱者残酷无情。正如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说的那样：“暴力是理解日本的关键。”后来武士道逐渐演变成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成为对外侵略的精神工具，这是日本民族的恶瘤，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社，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标准的武士，因此必须遵循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而不必看重别人的看法。

(四)日本民族的“耻感文化”

美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文化是“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一是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反复无常，行为方式易变。日本人的道德感、是非观是比较淡漠、模糊的，就像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6]所以，才会出现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当着6000多名中日双方宾客，把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称作是“添了麻烦”的一幕，激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反感。二是他律性的道德，名誉胜于正义。日本人以知耻为道德之根本，但这种耻辱并非来自内心的反省、自责，不是靠“内心良知”的约束，而是靠外部的强制加以保障。所以，日本对亚洲各受害国在历史问题上态度强硬，根本不予理会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就是因为这种“外部”的强制力不够，不能对它有制衡作用(大多数受害国国力没日本强，如果受害国是美国，情形肯定不一样)。三是极其看重名誉、面子。日本人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重要。对日本人来说，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他们认为承认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对亚洲各受害国谢罪道歉，就是民族自虐，就是日本民族的耻辱，就会在国际社会抬不起头来，非常有失面子，难以树立“大国形象”。所以，日本人对侵略战争不仅不愿从内心深刻反省，反而是试图要国际社会尽快将这段历史忘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国民性的狭隘保守、欺弱怕强、欺软怕硬、喜欢与强者结盟的民族特性，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日本真正要向政治大国迈进，那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如果对自己曾经做的事，不敢正视、不愿承担责任，这个国家何以获得各国人民的尊重，何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又何以担负起政治大国的责任呢？

三、发展中日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及不负责任的言行，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导致两国关系困难。为了化解两国的矛盾，改善中日关系。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既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和原则，又要灵活处理由于历史问题、现实利益冲突所带来的不利局面。

(一)在政治层面上，中国政府应该坚决地、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言行及日本政治右倾化

近年来日本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和否认侵略；修改和平宪法；重新发展军事力量，妄图充当军事大国，政治右倾化很明显。我们应该在国际重要场合，特别是在联合国，抨击日本的右翼言行，我们可在每年的联大会议上联合其他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包括美国)提出反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提案，要求日本向国际社会作出解释。同时，还要正确引导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每年重大的抗日纪念日，最高领导人要拜祭英雄纪念碑和抗战纪念馆，并举行纪念活动，这要形成一种制度，让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牢记历史、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要让全体中国人形成共识，如果我们不发展，我们还会再次遭受日本的侵略(实际上，纵观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是最大的也是最狠毒的，只有日本真

正欲置中国于死地，置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的万劫不复的境地。甚至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仍然在做他们“东亚共荣”的美梦和染指台湾的美梦)，这不能不令我们警惕。要把这种爱国热情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就要把我们的事做好。我们反对日本右翼势力，但我们要学习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如团结、敬业、做事认真、创新、节约等，把这些积极的方面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去，加快我们的发展。只有我们国家强大了，日本人才会尊重我们(因为日本人崇拜强者，尊重强者)。

(二)在经济层面上，积极稳定地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扩大互利双底的合作

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有极强的互补性，中国有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日本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1993~2003年连续11年，日本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中日两国政府高层关系的冷淡，已经严重影响了两国的经济贸易发展。虽然两国的贸易总额继续增长，但同比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有加速下降的趋势。2002年中国的前三位贸易伙伴已经变为欧盟、美国、日本。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受政治的影响，两国应在经贸方面扩大合作领域，扩大互利双赢合作的力度。但是，要真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关键还在于日本，所以要适当地给日本来华投资的日本财团施加压力，要使日本财团认识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行为将直接影响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此外，日本经济的复苏存在不可忽视的“中国因素”，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的重要程度在降低，但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程度在上升。据日本著名研究机构惠德银行研究所分析，在预计日本经济至2010年年均增长1.91%当中，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带动日本出口将使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

(三)在文化层面上，加强文化教育交流，增加了解、消除隔阂

文化是中日人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沟通交流的平台和纽带，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2006年日本安倍首相访华时提出中日双方学者合作进行共同历史研究，现在中日双方已就研究框架达成一致，成立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日各出10名委员。共同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中日还可共同编撰历史教科书，2005年，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了一本《东亚近代史》，在日本销售了37万本。二是双方设立基金，促进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互动，增加两国媒体相关人员的交流，让两国媒体能相互了解对方的文化，这样中日两国国民才能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想法，减少误解，增进了解。正所谓“理解源于了解，了解源于交流”。三是扩大两国互派留学生的规模。我国在日留学生2005年已达到4.4万人，居在日各国留学生的第一位。而日本来中国的留学生也从1987年的4027人增长到15万人，仅次于韩国在华留学生人数，这说明两国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通过这些措施来消除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使日本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正确认识历史，扩大两国人民在历史问题上的共识，这对于两国的相互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对于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优秀成分，我们应该取其长处，学习他们认真做事、团结合作、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而对于其民族性格中的糟粕，如尚武好斗、弱肉强食、否定历史等方面，应予以坚决地反对。我们应该团结大多数爱好和平的日本友好人士，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及其错误言行，继续扩大两国的利益交汇点，加强两国的官方与民间来往、互动，逐渐改善两国关系，建立战略互信，谱写中日关系的新篇章，毕竟中日两国是永远也“搬不开的邻居”“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总理温家宝2007年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说得好“贵国有句谚语:尽管风在呼啸，山却不会移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尽管经历过风雨和曲折，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根基如同泰山和富士山一样，不可动摇!”国际间关系尽管风云变幻，但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最终必然是友好、互利、和平!就像泰山和富士山一样不会动摇!只有这样，才能最终造福于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2]梁守德.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 [3]盛田昭夫.盛田昭夫和索尼公司【M】.北京:三联书社, 1988.
- [4]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5]高增杰.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6]普思·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M】.商务印书馆.1990.

(转引自《大连干部学刊》2008年2月 第24卷第2期 编辑:王熠)